

李盛铎及其藏书

张 玉 范

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善本书共约一万五千余种，十五万二千多册。就其数量和质量而言在全国是闻名的，而馆藏的李盛铎旧藏又是其中最出类拔萃者。

李盛铎为封建官僚，生于一八五八年，死于一

九三五年，字椒微，号木斋，江西德化县(今九江)人，光绪己丑科(1898年)进士。曾历任翰林院编修、国史馆协修、京师大学堂总办、江南道监察御史、出使日本国大臣、内阁侍读学士、顺天府府丞、太常寺卿、出使比国大臣、出使各国政治考察大臣、山西提法使、山西布政使、山西巡抚等职。民国后，又曾任大总统政治顾问、参议院参政、农商总长、参议院议长、国政商榷会会长等职。

李氏书原来不仅有古刻本书，而且有许多敦煌卷子。这是他在当时利用职权攫取的。在敦煌残余的古卷子由甘肃运往北京的过程中，他选取其中最好的据为己有。在抗战期间，这批古卷子的精华归于日本人，而其所藏的书籍则由他的后人卖给了当时的北京大学(其中有极少数零星卖掉)。

“木犀轩”是李氏藏书的堂号，最早建于李盛铎的曾祖李恕时。李恕，字卉园，道光时贡生，喜藏书，建藏书堂“木犀轩”于江州(九江)潭家坡，藏书凡十万卷，后来于太平天国起义时烧毁。以后，到李盛铎的父亲李明墀时又陆续搜辑。所以李盛铎喜书、收书，是与其父、祖有关的。

李明墀(1823——1886年)承兄明墀难，廪知县，后改授户

部员外郎，简放湖南辰州府知府，升督粮道兼署布政使加按察使衔，后调湖北总办粮加布政使衔……。他喜藏书、刻书。据《德化李大中丞行状》载，其“生平好聚书，廉俸所余輒购置经籍，所藏多至数十万卷，尝刻《范家集略》行世。又念乡先辈陈东浦方伯、吴兰雪刺史乾嘉时负重名，而后裔不振，为重刊诗集以传其人。”又命李盛铎“搜集名家著述，有关经学小学者汇刊丛书”。这就是李盛铎所辑的《木犀轩丛书》。

现在的李氏书一部分是李盛铎从他父亲手中承袭下来的（李明墀藏书多有其印记），而大部分是他后来搜集的。

李盛铎在任江南道御史时，其扬州寓所也曾一度失火，烧毁一些书籍。据《叶缘督日记》载：“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十一月二日，闻木斋扬州寓庐火，藏书二百篋尽毁。中多明人集部世多不经见之本，亦江左文献之厄也”。这是李氏书遭受第二次比较大的损失。

李氏堂号又称“麟嘉馆”、“凡将阁”，李氏书中除“木犀轩”印记外，有此二种印记者颇多。此外还有“庐山李氏山房”、“李氏玉陔”、“李氏家藏文苑”等等。凡其亲手校勘审定之本则有“木斋审定善本”，或“木斋审定”等印记。

李氏是近代很有名望的藏书家，他多收袁漱六的藏书，其中许多宋、元、明珍本，这些书多有“古潭州袁卧雪庐收藏”印记及“袁芳瑛”、“袁漱六”等印记。在其出使日本期间，在日本目录学家岛田翰的帮助下购买了许多善本书，其中很多是日本和朝鲜的古刻本、活字本和抄本书，有不少是我们国内久佚或罕见的书。在日本期间他还印过书，如藏书中的日本弘化四年（1847）复刻宋越州本的《尚书正义》二〇卷，就是他自己印的。当他了解到板藏东京某氏，就“托友人商假，印书百部，携归中土，分诂同好。”

李盛铎为官期间从不间断购书，常常是闻有旧书出售，必亲自往观，不惜重值购归。有时遇有好书因价昂贵或借校，或借抄，或令子侄辈抄写。有些书贾知其爱书，经常是亲自送上门来。日久天长，有时一种书失散多年也仍会买凑起来。如《大定新编便览》二卷，此为星命之书，存世者甚少，近世藏书家也多未见著录。李氏于一九一七年春买到残本，后过八年又恰遇此书所散失的部分。李氏得书后不胜欣喜，书后跋曰：“……延津剑合，何其幸也，因亟携归而合藏之，为秘册之一。”

晚年，他旅居天津，经常于书肆购书，还往来津京，到琉璃厂访书。当时有许多私家藏书散入厂肆，其中许多好书为李氏所购。

李氏书中除卧雪庐藏书外还有许多名家藏书，书中均有藏书印记。其中有宁波范氏、商邱宋氏、曲阜孔氏、四明卢氏、聊城杨氏、巴陵方氏、意园盛氏等。

由于李盛铎的长期努力，使李氏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。其数量之多，质量之高，内容之广泛都是许多藏书家所不及的。有些书在书史和刻板史上都有其特殊的地位，而其学术价值也是无可比拟的。本文只能略举数例，以见李氏书之一斑。

李氏书中宋元本近三百种。其中宋板的《周礼注疏》和《礼记正义》（宋刊元补修本）均为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。在经书的刻板史上，在此以前只有单注、单疏本，而注疏合刻是由此开始的。因书是黄唐刻于越州，且每半叶为八行，所以俗称“越州本”、“八行本”，又称“黄唐本”。南宋刻本的《尚书》，其行款与有名的福州官刻经相似，在传世的《尚书·伪孔传》中是最古的本子。

《史记集解》乃南宋初建阳刻本，字体秀劲，仿瘦金体，原是海源阁杨氏四经四史之斋所藏《史记》的四个宋本之一。

还有宋刻板的《汉书》和《后汉书》，前者为南宋建阳刘之问刻本，书末有庆元嗣岁端阳日建安刘之问识语，目录后有“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”木记，后者为黄善夫刻本，目录后有“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”楷书长方木记。李盛铎称《前汉书》：“字兼欧柳，墨光精湛，似余仁仲本《公羊传》；纸系宽帘，色亦精洁，真宋刊宋印也”。而《后汉书》“字体与刘元起《汉书》相似，而微展扩，纸色墨光则尤过之”。此二书均完整无缺，都是十分罕见的珍贵板本。

宋嘉定间汀州刻本《数术记遗》、《五曹算经》（后附《算学源流》），其中录有宋崇宁国子监的算学令和算学格，是研究我国算学史的绝好资料。最近文物出版社已制板复印。此二书是李氏于一九二五年自厂肆购得，其自谓是“近年收书所心赏者。”此外，宋刻中的《大唐六典》、《通典》、《说范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册府元龟》和《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》、《苏文忠公文集》等，虽然是残本，但都是孤本。宋刻完整的《孟东野诗集》、天香书院《论语》等，也是李氏宋本中的名藏。

另外，有关佛教经典，自北宋东禅寺大藏开始，如毗卢大藏、思溪园觉藏、思溪资福藏、磻砂藏、普宁藏以及明代所刻的南藏、北藏和径山藏等，李氏书中均有零种。这些比较罕见的佛教经典古刻本，不仅是研究佛教史的珍贵资料，也是研究雕板印刷史的宝贵资料。

在古代科技方面，尤其是古代医学方面种类很多。这些书有许多是李氏出使日本时购得的。例如《太平圣惠方》，宋太宗敕撰，成书于北宋初年，是中国医方书中具有总结性的文献。明初时尚存，《永乐大典》中屡见引用，后来佚去。今李氏书中所藏是日本江户时代影宋抄本。再如宋本的《医说》，日本传抄宋本的《杨氏家藏方》、《魏氏家藏方》，元本的《永类铃方》、

《孙真人急备千金方》等等，均是国内比较罕见的本子。

李盛铎在出使日本期间所购的日本与朝鲜的古刊本，也十分珍贵。如《天工开物》，日本明和八年（清乾隆三十六年）刻本，是书明崇祯间的原刻本国内罕见，此是日本江田益英复刻，摹刻精美。

《新雕皇宋事实类苑》为日本元和七年（明天启元年）铜活字本，是日本后水尾天皇敕板官书，乃是国内久佚之书。日本庆长四年（明万历二十七年）活字本《标题句解孔子家语》，是日本德川家康氏据元泰定元年苍岩书院刊板排印的，后附元人所辑《新刊素王事纪》、《圣朝通制孔子庙祀》，均是国内罕见的书。

朝鲜古刊本中《圣宋名贤五百家播方大全文粹》，宋魏齐贤等编，明正德、嘉靖间朝鲜铜活字印本。此朝鲜中宗朝用“乙亥字”排印。此书北京图书馆有残宋刻和清抄本，北大图书馆也有残宋刻。但此种活字本流传很少，中外也未见著录。《格斋庶韵唐贤诗》，明成化十五年朝鲜刻本，有“养安院藏书”印记。日本文禄元年（明万历二十年）丰臣秀吉率兵侵入朝鲜，掠夺朝鲜活字及书籍很多。此朝鲜旧刻，当是丰臣秀吉所虏的。

这些日本与朝鲜的古刊本书，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术资料，且从中也可窥见当时中国与日本、朝鲜间的文化交流。

李氏书中的旧抄本、稿本、批校本，其价值并不低于古刻本书。有些影宋抄本，一如宋板旧式，纸墨莹洁，抄字精整。它确实是既有学术性，又有艺术性。名家抄本中《贞白先生陶隐居集》、《班马字类补遗》，均出自叶林宗之手，叶氏在明代以影抄《经典释文》而出名。《昼上人集》乃钱谷手抄，钱氏擅长书画，书法精妙，冠绝一时。又如《谢宣城集》，是明末汲古阁影宋抄本，纸墨均佳，前人称为“下宋本一等”。除此，秦四麟玄览中枢抄本《隶释》和吕留良家抄本《竹溪虞斋十一稿续集》（存二十二卷）也都是极为稀见的。明抄毛校的《宋元名家词七

十种》二十四册，更是李氏抄本中的有名书籍。

稿本中《后汉书补注》，乃是惠栋（字定宇）的稿本，书为惠氏家抄，惠定宇手自签定，书中夹签均其手笔。此外还有戴震、孔继涵、焦循、缪荃孙等人的稿本，以及何焯、黄丕烈，顾广圻、吴騫及劳权等人的校本。

李盛铎本人不仅是一个藏书家，而且是一个校勘家，版本学家，近代精于校勘、收藏的傅增湘对他执弟子礼的。他几十年如一日地收书、校书，对一种书不经过反复认真地考证就不轻易地下断语。有些书校毕则自写题识，识语中述购书经过，书之流传端绪，考证板本源流，品评书之优劣。李氏还自写书目提要，据初步统计，他所写的提要与题识有一千五百余条、十五万多字。从这当中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广博的知识，审慎的校书态度，且为我们研究与利用李氏书提供了学术资料。

如《礼记集说》（宋卫湜撰）一百六十卷，手抄本，不署抄者姓氏及传抄年月，李氏通过对字体、行款等方面分析考证，认为是明末清初人从宋本转录。其跋语云：“卫正叔《礼记集说》刻入《通志堂经解》，何义门称其从两本付刻，皆未尽善。又七十三等卷《补遗》在卷数后，为顾伊人擅乱散入卷中，是《经解》之刻未为此书定本明甚。曩闻丰顺丁氏藏有宋刻，即义门所称项氏宋本者。后阅《丁氏书目》果有是书，卷首魏鹤山序已缺，仅存“了翁”二字，较义门所见又经剥蚀矣。今余得此抄本，魏序巍然独全，且玩其字体是从宋刻摹出，中间《补遗》均在每卷之末，确系宋本传抄，每半叶十三行，每行廿五字，间有多数字者，（丁氏书目未载宋刻行款，未知与此合否？）抄手虽不甚精，要是明末国初人手笔。有季沧苇图记。此书得之吴兴蒋氏，暇当以通志堂本详校一过。”

象这类跋语在李氏书中是不少见的。

李氏木犀轩藏书共九千余种，五万八千多册。其中旧刻本和罕见本约占三分之一以上。在旧刻板中，它包括宋、元、明、清的各种刻本以及抄本、校本和稿本，还包括刊印精美的铜、木活字本和彩色套印本。其装订形式上，它包梵笈装（经折装）、蝴蝶装、册叶装等形式；在内容上，包括经、史、子、集、丛书等，十分丰富。而大量入藏的日本与朝鲜的古本书，也是它与众不同的特点。

总之，李氏书确实是一个知识的宝库，所藏这些丰富的古代文化典籍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资料，同时又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。我们要认真地保护它，很好地利用它，使它在科学研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还应指出的是，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，李盛铎在考定板本及做提要的过程中也有个别的错误或疏失。

李氏书的整理与编目工作从一九四八年开始，到一九五〇年基本完成。那时由赵万里先生领导，宿白、常芝英、冀淑英、赵西华等诸位先生参加工作。以后又由常芝英先生完成收尾工作。到一九五六年印出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》上、中、下三册，按经、史、子、集，丛书五部分类。如今《全国善本联合目录》的编辑工作正在进行，李氏书中善本的绝大部分将收入其中，与广大读者见面。

